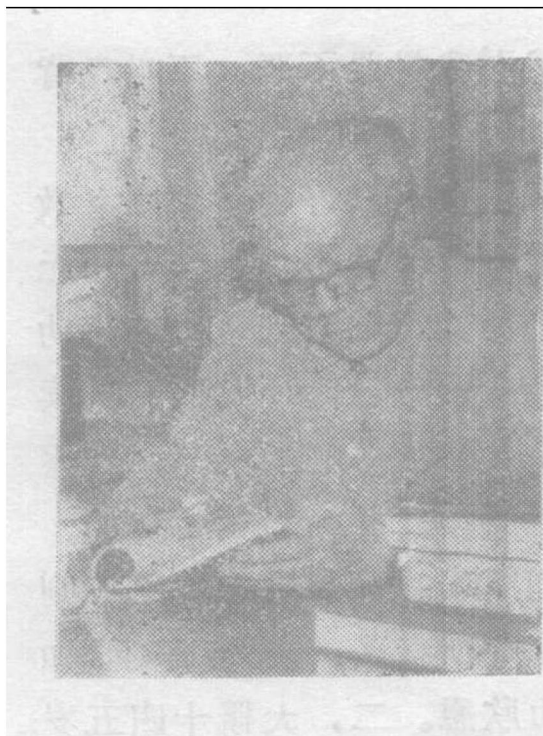


自 传

罗 继 祖



我读了严北溟先生的《青灯有味似儿时》一篇自传，知道严先生一生没上过小学、中学、大学，与正式学校文凭无缘，走的是一条刻苦自学的治学之路。我没有上过小学、中学、大学和严先生相同，不同的是我的家庭环境。

一

我家先人在清嘉庆年间就从上虞老家流寓江淮，过的是亦幕亦官的生活，没有科举功名，靠捐纳当官。同时也经营过商业，失败。但不像溥仪《我的前半生》说的“书商世家”。我祖父雪堂公（振玉）十六岁考中秀才，以后连试不中，就绝迹场屋。三十岁到上海办农报馆和东文学社，从事振兴农业和教育，为地方大吏所倚重。后来到学部当官，因为赋性孤僻不肯逢迎钻营，所以官做得不大。一碰到辛亥革命，他只好逃避到国外一意著书去了。我正在这时出生，因为是长孙，很受到祖父的疼爱。我记得当我四五岁时，祖父每天教我八个字。这时祖父正在辨析殷代的

甲骨文，他除教我识字以外，同时也把甲骨文写成字块教给我。祖父既反对新政权，自己屏居国外，因而也不许子弟上学校，我家上一代除我父亲罗福成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兽医科毕业外，没有一个是学校出身的。

祖父一生所嗜好的只有书籍、字画和古器物，这些东西等于他的第二生命，甚至可以说比生命还重要。祖父律己很严，待人很宽。

我自小体弱，读书资禀中下，祖父对我督课不严，不叫我背书。1919年我家从日本回国寓天津，那时我七岁。祖父回国后，非常忙，对子孙读书顾不得，既不许进学校，只好延塾师来家教读，修金月廿元，这个标准，好的老师是请不到的。因为塾师无专长，讲书没有留给我深刻印象。倒是祖父每抽暇来查问我的功课，值得记的有两件事：一，我小时喜欢读稗官小说，最先读的是《三国志演义》，初读不大懂，经人家给讲解了半部，才逐渐明白，后来就视同性命，一有功夫就去读，并模写其中绣象，又斐然有作述之意，把三国人物一一列成表，而汉献帝的臣下则单独作表，不和曹魏的人相混，祖父见到很高兴，说孺子尚知“汉贼不两立”，于是举以告人，引为欣慰。二，大概十四五岁时，写过一篇《曹操论》，大意说曹虽是历史上著名的奸相，但对汉献帝却始终保全，这一点还有君臣之义。祖父见了加圈，认为有见地。

我八岁时已能给祖母写家信，而讲读古文则是祖父给我开蒙的。记得第一次讲的是《桃花源记》和几首唐人五七言绝句，又教我文译白，白译文。我十七岁读毕四书五经，最爱读的是《左传》，这和我后来决心治史有一定关系。对于古文，塾中所采用的是《古文观止》、《古文雅正》、《古文关键》、《韩文笔法百篇》等，每一文一般读通百遍。开始读不大懂，读熟了就渐能领悟，当时没有人给讲语法，而下笔写文言文，竟能合辙，这完

全是“读”的功效。祖父给我讲的古文，以韩文为多，祖父说昌黎善辩不下孟子，其上人书，十之九是自荐，却说得理直词畅。祖父论文，不取宗派之说，对近世名家独推汪容甫，说汪文的规格、风味在唐人之上，对汪作名篇，到老还能背诵，可见好之之笃。又尝令我读《八家四六文钞》及《国朝骈体正宗》，说清朝人骈文中佳者能上追齐梁，次者也不在唐人之下。随举他自作的《国学丛刊序》，说那时正在校昭陵诸碑为《昭陵碑录》，是仿唐碑风格写出来的。

我十九岁出书房，也就是脱离了家塾，按学校的标准来说，算是高中毕业将升入大学了。又从吉林宣雨苍先生（铎）读了一年，宣先生最欣赏庄子的文章，因而讲《庄子》。不过，他讲的也没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在他手里作过不少篇论说文，也写过诗，得到他的夸奖。

之后就是由祖父指示我如何治学。在此以前，他给我讲过《四书》和《书目答问》，另外还开了一大批阅读书目，如前《四史》、《资治通鉴》、《周礼》、《大戴礼记》、《段氏说文解字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东华录》、《国朝先正事略》、《亭林文集》、《切问斋文抄》……等等，这些书，惟有《说文注》，因为对文字学不发生兴趣未读。对《周礼》，我觉得它里面的官制太完备了，不可能是周朝人的作品，当然那时我还谈不上有“疑古”思想；对《左传》特别感到兴趣，不过也有怀疑，一是史官何以有那样宛转动人的文笔，如身临其境；二是有些私房活也明白写出来，到底根据什么？三是古人的乱七八糟，偷男盗女的丑事很多，为什么说后世“人心不古”呢？要想在《左传》里搞点什么？表已有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史已有马骥的《左传事纬》和《绎史》，高士其的《春秋纪事本末》，不能再作舆台。后来在《小方壶斋丛书》见到一部丁寿徵的《春秋异地同名考》，一经查对，丁是抄人家的，而且很不全，我索

性来搞个全的，后来从几条搞上几十到百。费了半年功夫完稿。由于对地理知识浅薄，全书的体例应该如何未想好，一直废置，想找时间改写。到了“文化大革命”，这部稿本放在大连家里，被红卫兵当作“黄色书刊”给烧掉了。这虽不足惜，但它是我的第一部处女作。

以后我一面搞学问，一面做祖父的助手，给他誊写文稿，检查材料。他的字写得草，但我能辨认。在做助手当中，对做学问的方法领悟不少。由于《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提要》的启示，使我对目录学、版本学也引起兴趣。家里藏书多，可以恣我涉猎。祖父叫我编一本《丛书类目》，我也下了一些功夫，不过始终未能编成。又对于家学我有心继承，除对古文字学不感兴趣外，而对于祖父所搞的考证，却有偏嗜。祖父在学问领域牵涉很广，特别人家所不注意的他注意，如敦煌卷轴、殷虚甲骨、西陲简牍、内阁档案，而使他费精力最多的是辑录金石遗文，毕生未竟。他一生为学，不出这个圈子，而在方法上，大体以乾嘉考据学为依归。我对此只能是“望洋向若”，只想勉力继承他的一部分，那就是史学。因为上述那些，归根究底离不开历史，如不具备历史常识和其他辅助科目的知识，几乎无从下手。我在三十岁以前，《春秋异地同名考》以外还写了：

《朱笥河年谱》 《程易畴年谱》 《李屢园年谱》
《段懋堂年谱》 《明宰相世臣传》 《毛文龙传》 《老莲遗事》
《辽汉臣世系表》等八种。

这不算著书，只是幼年的习作，现在看来，资料搜集很不完备，错误也多。《老莲遗事》稿未刊已佚，《毛文龙传》刊于《中和》杂志中，其他都有石印本。

《辽史》，我是怎样开始研究的？二十四史中《辽史》最简陋，错误又最多，祖父因作《辽韩椅、贾师训两墓志跋尾》，发现《辽史》中种种问题，认为今后辽人墓志将大量出土，可以利用

来校史，把这事嘱咐了我，叫我把《辽史》通校一遍，写成校勘记。我接受任务后，首先阅读了《辽史》两遍，有关《辽史》的书籍，我也找来了一些。大约两年的功夫，写成《校勘记》八卷。先由家里石印。我当时治史功力尚浅，仅能仿汪辉祖《元史本证》的方法，以本书证本书，而没能提出辽史上的重大问题并加以解决。过蒙当世学者不弃，提到辽史，总要联想到我，使我很惭愧。这部书共印了三百部，旅大光复时，付之一炬。解放后，我手内仅存一部。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来信，商量加上标点再版，次年10月出书。

雪堂公雅擅书法，除草书外，甲骨篆隶楷行无一不工。我小时濡染，也很爱学书，不过我不学篆隶。开始虽从描红起到影摹碑帖，但只能粗具形似，雪堂公却奖励有加。十五岁临唐人写经，才悟到写字应讲结构，从此才稍上轨辙。又家藏古人画迹甚多，十四五岁时，雪堂公令从师学画山水，从《芥子园画传》入手，然后遍览家藏古画，略识其源流正变，下笔能饶古趣，也获得雪堂公的赞许。转眼几十年，除解放初期有一段时间没拿过毛笔，此外未尝间断，特用力不勤。七十以后，应人求索遂随意命笔，实于古人意趣无所得，惟尚未流入俗恶而已。画仅偶一为之，从临仿进入自运。七十岁后所作稍多，因系业馀，不敢厕名画家。尝乞人镌一印曰“胸有丘壑”，不识能为方家所许否？

二

社会上找工作得凭履历和学历。我家子弟无学历，找工作成了障碍。雪堂公七十岁以前，从不考虑此事，七十以后，感到老境日增，又感到自身一些说不出的痛苦（特别是晚年陷身伪满的一段），默察将来的世界不会总像他主观所安排的那样延续下去，不得不预为子孙谋出路。当时最迫切的就是梓溪五叔（福颐）和我了。两人虽都没有学历，惟在家学方面有点继承，又都

写过书，不同白纸一张。五叔首先弄到沈阳博物馆学艺官。我呢，先弄了一个满日文化协会的东方国民文库编辑。不久沈阳满洲医科大学预科出了一个国文教师的缺。预科主事黑田源次博士见到我的《辽史校勘记》，便主动介绍我去预科任讲师，这时我廿七岁。

医大预科是入本科的桥梁。中国学生学日语，日本学生学汉语。中国学生入学时，日语已有基础，不同于日本学生，所以挤出一部分时间，叫中国学生上汉文课。无课本，由主讲教师自编，并亲刻钢版交事务室发印备用。

我平日下帷读书，很少和外人接触。首次上课，面对许多学生，其年令又不比我小多少，感觉奇窘，站不稳讲台。好在开板就唱，不说闲话，长了也就自然了。我选了我较熟习的唐宋古文作教材，他们听了当然不感兴趣。课都排在上午，不坐班，因此有较多时间自学。次年六月，雪堂公弃世，请假回旅顺治丧。秋天丧事毕回校，仍如前一样。感觉自己无论学力和教学经验都不够为人师。校内皆日籍教师，我不懂日语，平日接触的只有同教室的几位，他们都是教语言的，懂汉语。又一年以后，预科的国文课被废止。黑田不愿我失业，把我介绍给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任讲师，虽然同是讲师，却无异平升三级。家中自祖母以下都以我孤身出远门为虑，加以当时政局依然恶化。但当时我的思想：东北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殖民地讨生活都属汉奸，所以我决计不做伪满的事，但为了生活，也只有教书这种职业可做。况又是教古书，谨言慎行不会出什么乱子。再说日本京都雪堂公的故旧多，处境可能比留在东北（伪满）或华北（伪政权）教书要好，故决计成行。

我到了京都，雪堂公旧日执友多半作古，只有狩野君山先生（直喜）健在。又结识了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两君，两君留学燕都时，列名杨雪桥先生（钟羲）门下，在国内则出湖南（内

藤虎次郎）、君山两先生之门，称高第弟子。两君皆娴汉语，此时仓石正与青木迷阳先生（正儿）共担任京大中国文学讲座，吉川则在另一研究机关——东方文化研究所任经学文学部主任，有一时瑜亮之称。日本人很重世交，使我有“宾至如归”之感。在此任课极简，学生仅四五人。公余则在研究所自修，有专室。所中藏汉籍颇富，有吾家所未备者，藉以增补了我所辑录的《辽史拾遗续补》稿，又写了一部《涧上师友记》，乃仿《船山师友记》而作（后稿在长春佚失），又将旧作《登科记考补》投登京都《东方学报》。京都是人文渊薮，予得一一纳交，其中如平冈武夫、藤枝晃两君皆能汉语，故过从频数，且帮了不少忙。其国内旅游胜地已处于非常时期，一律谢客。我不通日语，出门须人陪伴，所以很少出门。我初去着伪满协和服，人皆指目我为满洲国人，我很讨厌这样称呼，便改穿西装。在日本两年，除生活上比较孤寂，有时至食不果腹外，尚无其它意外事故发生，详我的《京都杂忆》一文。1943年夏，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京都上空时出现美机，惟未投弹，我遂藉暑假辞职回家了。

我长期生活在封建家庭的气氛窒息里，并不甘心当亡国奴。问题有一个傀儡皇帝溥仪在，全家人在雪堂公的率领下都属望溥仪能救民水火，实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封建迷信和幻想。过去我们对共产党有错误看法不用说，对国民党的认识倒比较清楚。他们为保存自己实力，宁可牺牲全国人民生命，任敌人屠杀，自己安坐大后方拥兵不动。胜利后又成了下山摘桃派，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能知道“将来中国重兴大业，他只能是绊脚石。”那么属望谁呢？心里很渺茫。有时我独自澄思，如讲斗争，新的一定战胜旧的。国民党已腐败有名，新的是谁呢？当时与国民党处敌对地位而有实力的只有共产党。可惜我对共产党了解得太少。

我从海外归来，仍不能不继续谋食。正好日人邀请去长春搞文化事业，计划组织一个大型的出版机构。后台老板是伪满第一任

国务院总务长官，也就是实际当权者荣厚（叔章）领其事，任我为理事。荣和雪堂公旧交，对我也独垂青眼。实际这时东北为支持日本无休止的战争，已搜括得民穷财尽。兴办文化事业只是将没落时的一霎回光返照，什么名堂也搞不出，只乾陪他们坐了几个月。“八一五”日本一投降，伪满也就完蛋了。

三

我是这一年的冬天从长春冒险回旅顺的。在长春听到种种传说，国军就要来接收，又说东北是八路军接收区域。一时地痞流氓大肆活动，宣称无论那派来，入教就有保障……等等。我冷眼默察，敌人倒下去，还要引起一场大的争夺战，老百姓过不了好日子。回家一看，一家流离失所的苦况，是我平生从未遭受到的一种严重灾难，觉得一切一切都完了。亲故中有人要给我介绍国民党张嘉璈（张原是银行界，后入政界），我嫌于与国民党素无瓜葛，耻于自媒；八路军更无线索可寻，感到两眼漆黑，前路茫茫。又眼见我家藏书被劫，一麻袋一麻袋的塞进仓库里，这是雪堂公毕生心力所萃，又是我平日翻阅所熟习的，更使我想起来心疼。谁知道，这却是我一生参加革命工作的转折点。

耳边似乎听说共产党有人从延安来旅顺。果然不久，新成立的地方政府派人来找我谈话。见到的是廖华同志（本名陈继周），他说延安当局知你家藏书被劫，文化攸关，特派我来视察，如不急下手整理，书不久就会被偷或霉烂掉。现整理乏人，不知足下能否出来担任？又申明书的所有权仍属你家的，我们只是出面帮同整理，因为我们是干革命的，把它作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你愿不愿意参加革命工作？我听后考虑，第一，藏书得救；第二，正苦于无从进身，人家来了，焉能拒绝；第三，革蒋家王朝的命，有什么不愿参加；第四，十口嗷嗷，吃饭问题首先解决了。立刻答应。就由廖华授意人民政府派在教育局当上一名科员，以市内废娘娘

庙作整理处，这项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后来才知道，廖本从大连满铁图书馆而来，时馆在苏军手，廖从而探知我家书被劫事，又在馆见了我那部《辽史校勘记》，知道罗家有人能胜任整理。此外据说还有中间搭桥人，不暇一一细说，总之是一幕巧缘。

在旅顺废庙整理一年以后，大连关东公署成立，又将书籍全部运大连，以大连市内两废佛寺为整理地。而廖亦来大连任文物保管会主任。及1948年我将书全部整理完，遂禀祖母命，由我及承祖弟（后改名律）出名，书捐归公有，而我亦转职文管会。廖在劳动公园设小型劳动人民文物陈列所，叫我在所工作，未几廖去福州。时北京已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我向文管会申请去京或去沈工作，结果批准去沈，遂由东北文化事业管理处任我为研究员，派到博物馆。

自关东公署成立，才开始政治和业务学习活动。我开始接触了新事物，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初步理解和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毛主席的著作，首先读的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透辟明快，告诉我们许多革命原理原则与战胜美蒋的道理。接着又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多篇，语语切合中国革命实际。又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搞革命要先树立宏大理想与不怕牺牲的精神，才不会成为空喊或走入歧途。因我对中国历史有素养，接受较快，同时也对过去的迷信作了对比和评判。业务方面读了范文澜、吕振羽、叶蠡生的几本书，觉得观点新颖可喜，算是人民历史已具有雏型的作品。开初给我影响最深的就是廖华同志，他待人亲切，对文物工作又极热心。当他去福建时，叮嘱“服从领导少说话”，当时只认为他肯对我说“知心话”，现在细想，这句话的含意何等深远啊！

我1949年冬到沈阳博物馆。处长王士修，山东黄县人，革命老干部。图博遭破坏极大，是在伪满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此时五叔早进关，熟人中惟李公符（文信），其他皆解放后新识

者。图博皆在群众积极要求下所筹建，且已正式开馆。未几而抗美援朝战争起。未逾月，大连满铁图书馆经我方几度向苏交涉，正式交还。东北文物处协助派员接收，于是图博两馆研究员多被派，我也在内。当时朝鲜战局紧张，万一蔓延，一海之隔的旅大也决非善地。于是一面点收，一面装箱，计划疏散。十几个人忙了一个多月才结束。忽然局势又缓和，美军退到三八线以南，和平在望。于是旅大图书馆在烽火刚刚平熄即开馆了。馆中缺人，旅大文化局征求东北文物处同意把王士修和我留馆。我家本在大连，老小累重，便答应了。我与士修均在参考研究部，士修当主任。

从1950年到1955年4月我调职东北人民大学止（即今吉林大学前身），在这五年中，事务性劳动不计外，主要是供应外面来馆查找资料，非常繁冗。为了满足对方要求，忙得日不暇给，根本没有余力再搞业余研究了。后二年才稍能抽身整理馆藏善本。馆藏善本最精华部分早被苏军掠走，我将余剩和我家藏书中善本归馆的（我家藏书中善本现大半藏辽宁省图书馆），共得若干部，统统写成详细卡片入藏。

市辖馆资力薄，旧藏图书除供查找资料外，无从发挥其作用，更谈不到研究。士修卒業辅仁大学，于英文有专攻，馆藏外文书不少，却无从进行研究。我们对案五年，情谊相投。

1955年4月，我调去长春，而家属仍留大连。由于大连地方环境和气候都优于长春，老母病体和儿女辈工作学业都不愿转离，直到老母弃世，二十四年之久都在学校过独身生活，生活甚苦，但我向来不讲究个人享受，尚能相安。

四

我来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还是讲师，有人为我抱屈。但我自己明白，过去为敌伪和外国人服务是忍辱混饭吃，和今天当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学的人民讲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没有参加一天革命，居然当上人民讲师，站上人民讲坛，这一切荣誉都是人民和党给我的，根本不应再去计较职位的高低。时历史系成立不久，叫我开“中国史学史”课。这门课和我倒对路，不过，我没有这方面的教学经验，不知从那讲起，并且要用历史唯物论作指针就更难了。找前人成果都写于解放前，不合用。我考虑，既叫“史学史”，学指什么？没有书本，何从见学。马克思如不写《资本论》，马克思主义也不克成立，不能脱离书本去找观点。于是我就拿金毓黻先生所写比较晚出的一本作基本教材，章节上加以剪裁，后面加上解放前后新旧观点的论战和近日新史学的成就，以及我初步掌握的新知识，大胆试写过两次讲稿，课也一连上了好几学期。顾颉刚先生来校时，我当面请教，顾说此课很难讲，但金书暂可用。1958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我的讲稿被作为重点批判的靶子，我写检讨说，我对马列主义不过一年级小学生水平，如何能胜任教这门课，我诚恳地接受批判。实际这时学校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发动学生搞思想批判，光会背教条，水平不高，在这样气氛下我不能再教这门课了，由另一位老师教。事后，有一位老师对我说，你的讲稿被批判了，为什么他（指那位替我课的）还用你的讲稿？我觉得好笑。那时历史系教师的知识水平不过如此。

1960年我开始教《中国历史文选》课，这门课，小说是工具，大都是通过各种典型作品，培养学生阅读古文能力并进行研究历史，也是历史系的一门重要课。它不同于中文系的“文选”课，只重在语法和词句的分析上。我讲此课侧重讲些历史上的典章制度以及中国史料学和史学发展的常识，把它穿插在每篇文章里。这样做，颇受部分学生的欢迎。我从1955年到1963年主要教过这两门课。这两门课在历史系都相当重要，但不受系领导的重视，后来《史学史》课没有改进，等于无形取消，《历史文选》课在我1963年去北京由别人上时，因领导不重视，学生不爱听，教师不爱

讲，也横被淘汰了。

1963年秋天，我被临时借调到北京中华书局校点《宋史》。廿四史出标点本是按毛主席指示进行的，搞了几年，成书不快。至是改变方法，每一部史由一两人包干。校点人从各大专院校召集，集中到翠微路中华书局。《宋史》本是历史所聂崇岐教授点校的，聂中途逝世，中华改约北大邓广铭教授，没想到邓教授见了我写的《读金史傅慎微传》，竟向中华推荐我去。我除对《辽史》有点研究外，《宋史》、《明史》虽时常涉猎但并不熟，且《宋史》卷帙浩繁，一个人搞，限制两年，肯定难成。同事又都是国内有名的专家老辈，我才五十出头，滥竽充数，感到信心不足。我写校点方案说，《宋史》一易二难，易指版本，现在共推商务百衲本最原始；难一指参考书太多，且多数是大部头，难二指前人成果比较少。中华酌添了一两位助手。我到京不到半年，突然血压增高，经常失眠，以致精神萎顿，工作进展很慢，直到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早过限期，才完成本纪、表和列传的一部分初稿。现在《宋史》校点本早已问世，是“文革”后上海方面集体搞成的。其中属于我的劳动成果不多。

提起运动，我来东北人大后，肃反、思想改造、大炼钢铁、大编教材、反右、交心，一直未断。我既看到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偏差，也看出党中央搞运动不得已的苦心，特别如反右，的确有些人乘机恶毒地攻击党，要拆党的台，气焰嚣张，不压不行。

1966年的“文革”，以吴晗《海瑞罢官》作导火线。实际酝酿已久，箭已在弦，不得不发。当时我们校史小组是近水楼台，常听到传达消息、有人还参加讨论，耽心吴晗要被当作政治错误处理。后来不幸言中。眼看一场气势澎湃的大运动即将开始。北大的大字报贴满，中华书局也应声而起。组内中央民族学院傅彬甫（乐焕）因有家庭负累，又和胡适有关系，民院已把他作为运动对象，叫回院检查。彬甫一时心窄，投陶然亭捐生。我和他在沈

阳联床半月，在京又同在一组，情谊颇笃。中华书局为此，怕我思想上也有顾虑，所以组内郑天挺、唐长孺两教授代表党向我多方宽譬，说傅已误，幸勿再误。我深知我和各方面都无牵涉，先人问题也不会落到我的头上。所以心境很坦然，不过看来势甚猛，我虽位卑望轻，依个人条件，万难倖免，早有了思想准备。

廿四史校点工作先说照旧进行，而事实不可能。六月中我扶病回校，一到文科楼，见大字报已贴满，涉及很多人，也点了我的名。此盾和系上的所谓“牛鬼蛇神”幽禁斗室，心怀抑郁，惟于思老（省吾）心胸开阔，他说一个人一生，酸甜苦辣都应尝遍，我们今天的遭遇何足为奇，应该相信党，相信群众中主张正义的，这使我破涕为笑。幸运地是我没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只是“审查对象”，吃的苦头究竟比“反动权威”轻得多。

1969年春天，历史系第一个解放了我，因我戴不上合适的帽子。据说想了好多，后来觉得都不恰合而放弃了。解放的当晚就宣布我已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并说我还有一技之长。“四人帮”统治时期各种刊物都复活，我一篇文章没有写，有功夫尽量写我的读史笔记——《枫窗脞语》。我写笔记导源于张丛碧先生（伯驹）的《春游琐谈》。现在《琐谈》已由中州书画社出版，《脞语》也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脞语》是我十年浩劫中的唯一纪念品。

吉大搞了较长期的教改，改来改去，仍不免走老路。1972年正式招生。我又上了一段“文选”课。本来只有中青年教师可以任课，我教“文选”属于特殊。当时历史课倾向讲“农民运动史”，所以我选了《资治通鉴》中有关材料。系上考古专业成立，考古领导邀我去教“东北地方史”，由于我不懂民族学，又对东北地理不熟习，因而兴趣不大，不是教这门课的合适人选。勉强上了几期，侧重古代。后来带研究生，带了一届，毕了业。由于我缺乏经验没能带好。

五

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所有新旧知识分子在党与人民的关怀下，意气风发，同心协力，为使我国早日实现四化，贡献力量。特别老知识分子誓以有限岁月，力任艰巨，不是著书立说来启牖后学，就是指导研究生使后继有人。我的心情也是如此。但遗憾的是，我身体自幼缺乏锻炼，中年又失护养，临老疾病环生。1982年因患脑动脉硬化，引起两耳听力丧失，已成半废。书不能教，研究生也不能带，但还能伏案写作。台湾出版了《罗雪堂全集》，洋洋一百四十册，有人想起国内也该印这部书，建议教育部由吉大编辑出版，并指定叫我任主编。我幼年即作雪堂公助手，对他的品格、学问，家中除五叔外只有我了解最多。我写过一本《永丰乡人行年录》，1980年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对雪堂公一生负谤情节进行了辨驳。1985年又写了一部回忆录——《庭闻忆略》，由长春市政协作为《文史资料》第十辑出版，更为详尽。雪堂公以后半生精力、光阴为溥仪效犬马，这是他牢守封建忠君的教条招来的悲剧，其详具见《忆略》，不复赘述。正像政协《情况交流》上说的“罗振玉是一位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在政治上有严重过失的历史人物”，我是他的孙子，也不能对他曲加回护，而要依据事实，秉笔直书。

台湾《全集》印本把自著和校刊的书编在一起，所以卷帙庞大。而实际尚不完全，计缺三十三种，兼有误收五种。

这次编印，除去所刊书，只收论著，所以叫《雪堂学术论著集》，这是采纳华中师大张舜徽教授的意见。张教授与雪堂公非亲非故，但对雪堂公一向了解支持，国内殆无第二人，并且为《论著集》写了序言。论著集分为十集，一百〇三种。所内连我共有八人参加。原本校勘不精，现在统加校理，为了方便后学阅读，普加标点。我对这项工作虽然是轻车熟路。但老病侵寻，每

为工作带来影响。现在预计本年内全部完成底稿交中华书局出版。

最近因学校用我的名义招来文献学研究生，虽上课有人，而我独袖手说不过去，现每周给研究生讲《论语》一次。此外便是经常写点杂文，或作书画，多少做点有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自三中全会后，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1978年，1983年连晋级为副教授、教授；1985年省人民政府颁发给我“人民教师荣誉证书”；去年吉林大学四十年校庆，因我在校任课三十年以上，特颁发给我“荣誉证书”。此外，我又是长春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九三学社分社会员，吉林省归侨、史学会、考古学会理事，武汉市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学术委员，中国辽金史学会，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书协分会名誉理事。以外挂名顾问的还不少，不一一备举。总之，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多，而我给党和人民的贡献太少。

因为耳聋，所有省内外的政治，学术集会都不便参加。但守死善道、积极用世的思想，并未因病稍减。现在每天必看报，注意社会上许多新动态。刘梦得诗：“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我也要以病废之身跟上时代步伐，唱《杨柳枝》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六

我生活于新旧两个不同的时代，走过的道路不算十分曲折崎岖，也正因为未经历过艰苦磨炼，治学和教学上所获得的成果也不大。

有人问，你在学习教学中的态度，以及方法、经验能不能谈一谈。当然可以。

我在研究态度上，紧紧抱定一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态度，决不大言欺人。自己的能力有限，既为人师，对“诚实”两字，必须笃信谨守，无论在课堂上讲授或答复问

题，都据所知道的无保留的去做，不知道的决不乱讲，以免误人，写文章也同样，于思老常说，他写文章有“三不说”，人家说过的不说，叫不准的不说，证据不足的不说。我很同意他的话，所以也遵守这个“三不说”。我写的那本《枫窗脞语》和最近已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墟户录》都是“订短之学”，没有较大的发明，但是不“剿袭陈言”、不“道听涂说”传播不根流言。这两点还敢自信。

谈到方法，我上面说过，我祖父治学是沿袭清朝乾嘉考据学派的，由于生值闾光，所见的古器物、古史料都超越前人，因而在治学上能有所发展。我只是承其绪余，而且所用的方法未免太陈旧了，一般还是凭脑子默记，平日懒写有系统的笔记，就连卡片都不习惯使用，研究一个问题，每每感觉临时查书费事，这方面不如年轻同志了。

至于经验，其中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就成功的说，我虽然很不幸出生在一个古老封建家庭里，从小思想里就深深地打下了阶级的烙印，所幸我喜欢读史，对古往今来，胸中还能了然，并清楚认识了当前的社会，因之在两条道路抉择上未迷失方向，即在每次政治运动中也都能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失败的有两项：一是学习马列理论方面没有下过苦功，所得只是一知半解，写不出理论性较强的文章；二是长时期不大愿意过问政治。现在年老多病，才痛感政治如果搞不好，经济、教育、文化也不会好，“政治是灵魂、是统帅”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尤其当前“安定团结”的和平环境应该珍惜，没有这样环境怎么能建设四化呢？

我因病不得出门，致所有社会活动都不能参加，只得从报纸上了解社会，究竟不如亲身参加了解得深刻。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二日第二稿

作者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